

杨龙 校点

公羊传 穀梁传

国学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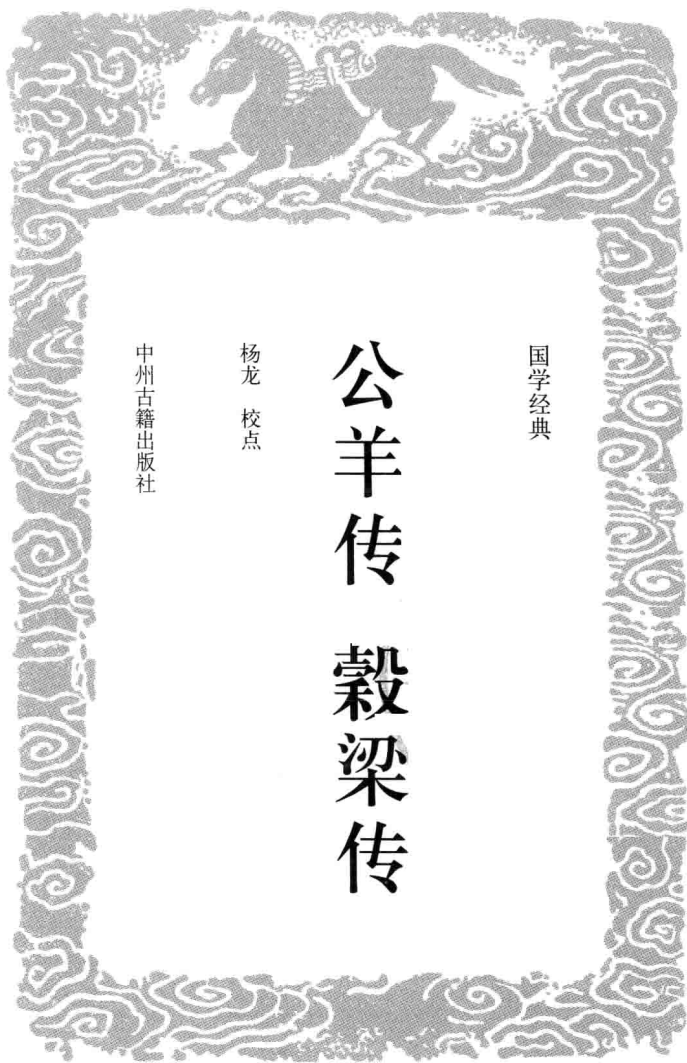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国学经典

公羊传 穀梁传

杨龙 校点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羊传 穀梁传/杨龙校点.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5.4

(国学经典)

ISBN 978 - 7 - 5348 - 5233 - 6

I. ①公… II. ①杨… III. ①中国历史 - 春秋时代 -
编年体②《公羊传》③《穀梁传》IV. ①K22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4058 号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河南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40mm × 960mm 1/16 印张:22

字数:244 千字 印数:1 - 4000 册

版次: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前 言

孔子整理鲁国史官所记史事而成《春秋》，《春秋》遂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不仅如此，孔子撰《春秋》而寄其微言大义，该书也成为后世研究儒家思想的经典著作。然而，由于《春秋》记事、叙述较为简略，故后世儒家多有专事解释《春秋》之著作出现，这些著作或丰富《春秋》之记事，或阐发《春秋》之微言大义，也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孔子《春秋》成书之后，史官左丘明又“论本事而作传”，其目的在于做到最为准确地传达孔子在此书中表达的思想，是为《春秋左氏传》。当然，由于各人理解上的偏差，后世也形成了对《春秋》的不同解释。到汉代初期为止，传《春秋》者主要有《公羊传》《穀梁传》《邹传》《夹传》四家，以及像《铎氏微》《张氏微》等影响较小、流传不广的流派，又有以疏解四家思想为主的《公羊章句》《穀梁章句》《公羊颜氏记》等著作。就学术发展状况而言，到汉代为止，《春秋》已经成为一门专门之学。

在解释《春秋》的诸家传疏当中，又以《公羊传》《穀梁传》和《左传》三家最为有名，三者合称为“《春秋》三传”。其中，《左

传》主要详于记事，丰富了《春秋》一书对史事的记载，而其他二传则重在阐释《春秋》之义。虽然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还存在着争议，但一般多认为，《左传》属古文经，在刘向父子校定秘府藏书之时才为人所知，故《左传》为汉代学者所知，在时间上要晚于《公羊传》和《穀梁传》。《公羊传》和《穀梁传》为汉代以降的学者所传习、研诵。至唐代官方指定“九经”之时，二传被列为“九经”之一。南宋时期确立儒家的“十三经”中，《公羊传》和《穀梁传》仍旧位列其中。《公羊传》和《穀梁传》的论述构成了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下，让我们对这两本儒家典籍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一、关于《公羊传》

一般认为，《公羊传》的作者为公羊高。《汉书·艺文志》著录了《公羊传》，称共有十一卷。班固于此书下自注：“公羊子，齐人。”颜师古更进一步确定公羊子名高。因此，一直以来，常以公羊高为《公羊传》的作者。唐代学者徐彦在《春秋公羊传注疏》当中更进一步坐实《公羊传》的传承情况：

孔子至圣，观无穷，知秦无道，将必燔书，故《春秋》之说口授子夏。度秦至汉，乃著竹帛，故《说题辞》云：“传我书者，公羊高也。”戴宏序云：“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与董仲舒皆见于图讖。”

徐彦引用东汉戴宏的说法，对《公羊传》的作者和传承情况进行了

详尽的描述：孔子传《春秋》于子夏，子夏又传与公羊高，此后，《公羊传》遂以家学的形式在公羊氏家族中父子相传。然而，对于公羊高作《公羊传》一书的说法，后代学者也并不完全赞同。综合学者的意见，他们有以下两点反对意见。第一，根据相关记载，《穀梁传》的作者也是受《春秋》于子夏，二书作者不太可能同师而异说。第二，《公羊传》的作者和传授情况是于东汉戴宏的著述中所见，而西汉时期的史籍却无任何记载，一般来说，在知晓古事方面，后人不可能详于前人。第三，徐彦等在对《公羊传》的作者的确方面，称孔子预知其人，故有相应的传授安排，这无疑是带有谶言纬语的分析，自不可信。

事实上，依据先秦古籍“众手成书”的一般规律，现代学者更倾向于认为《春秋公羊传》当出自多人之手，当然，公羊子的作用可能是比较主要的。根据上述戴宏的记叙，我们可以知道，《公羊传》自公羊高到公羊寿，历经六世，采取的均是口授方式。自到公羊寿之时，在汉代国家的支持之下，公羊寿才与其弟子胡毋子都将《公羊传》写成定本，著于竹帛。为凸显《公羊传》的权威性，公羊寿很可能在本书的作者和传承情况方面有所托附，而后来戴宏更将这种托附之事进一步坐实，这无疑会影响我们对本书作者的判定。更为重要的是，传中又有子沈子曰、子北宫子曰、子女子曰等，这些人也应该是传授《春秋》的经师。所以，《公羊传》应是在公羊高、沈子等儒家经师的共同传承中形成的，该书反映的是儒家一个分支学派的思想。

《公羊传》是对《春秋》的解释，重在阐释孔子编《春秋》时的贬恶扬善，点明《春秋》一书的微言大义。本书传文部分采取问答形式，在解释历史事实的同时，又着重阐明了儒家的礼仪规范和

政治理念。经过历代学者的反复分析和深入发掘,《公羊传》的重要观念都得到了很好的清理和阐释,而这种观念阐释又反过来影响了历代学者的政治思想,并由此影响到历朝历代的政治运作。

《公羊传》开篇即提出“大一统”的思想,这是为历代政治思想家极为推重的观念。在解释《春秋》经文第一条“元年,春,王正月”时,本书是这样分析的: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在这里,《公羊传》对经文的解释既有与《左传》和《穀梁传》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于二者之处,这就是“大一统”的提法。黄开国先生就指出,这一段传文强调“文王”“大一统”等概念,就是提倡一种政治理念,即以周代文王之政治为最高理想,希望在以文王为准则的政治规范和政治道德之下实现天下统一。显然,这里所谓的“大一统”不仅是要求天下形式上的统一,而且也为天下一统设立了最高政治规范。在其后对《春秋》经文的解释中,这一思想也贯彻始终,成为作者评判各国君主政治统治的标准。

当然,春秋战国以降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也影响着人们的思想。由于一些诸侯国的势力日益强大,他们渐渐脱离周天子之命,主导国际政治局势。周王朝的权威日渐削弱,诸侯的政治野心逐渐膨胀,所谓“礼失而求诸野”。在周天子与诸侯之间政治地位的这种微妙变化中,也带来了天下秩序的变迁。面对这种变化,《公羊传》对《春秋》的相关解释中一方面仍坚持周天子的权威,但同时也承认诸侯权势增长的客观事实,并肯定其积极意义。如僖公元年,齐、宋诸国率军救邢,《春秋》称齐师、宋师,对此,《公羊

传》有如下解释：

曷为先言次而后言救？君也。君则其称师何？不与诸侯专封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诸侯之义不得专封也。诸侯之义不得专封，则其曰实与之何？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力能救之，则救之可也。

在此，《公羊传》一方面特别突出“诸侯之义不得专封”，这正是凸显周天子对于诸侯的权威。但另一方面也指出，这种“不得专封”的书法仅仅体现在表面上，实际上它作为一种原则已经无法有效践行。尊重周天子的权威与承认诸侯权势之间看似存在矛盾，但这也正反映了《公羊传》在顺应时情上的合理变通。《公羊传》谓：“《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所见、所闻、所传闻，这正是为后世公羊学家所阐发的“三世”观念。《公羊传》突出“三世”的差别，与其发展变化的观念是相适应的。

维护周王朝的权威地位，是《公羊传》始终坚持的政治理念。《公羊传》特别强调夷夏之辨，也是这一政治观念的扩展。《公羊传》在夷夏之辨方面同于孔子的观念，它总结《春秋》的观念：“《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严格区分诸夏与夷狄的等次彝伦和文化差异，其出发点正是凸显周王朝在文化上的权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与先秦儒家之“吾闻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的观念不同，《公羊传》对于那些违背华夏礼仪规范和政治理念的行为以“夷狄之”。对于《公羊传》在华夷之辨的问题上坚决维护文化正统的思想，汪高鑫先生给予了积极评价，他认为《公羊传》的华夷观念更具开放性。当然，这种开放性并没有动摇其对

正统性的维护。

《公羊传》这种维护正统性的同时又具有发展性和开放性的特征颇为鲜明，正因为此，《公羊传》也赢得了后代儒家学者的高度关注和积极研究。如前所述，自汉代初期，《公羊传》就有着完整的传承线索。随着时间的推移，《公羊传》的文本也一直得到有效的传承和研究。

在中国历史上，对于《公羊传》的传承和研究历经两个高潮时段。第一个时段是在两汉时期。汉武帝大兴儒术，《公羊传》则得以立为学官，有了更为稳定的传承环境。一批公羊学者相继兴起，他们为发扬《公羊传》的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汉武帝初期的董仲舒为第一位系统阐释《公羊传》的思想的学者。董仲舒向汉武帝献“天人三策”，申明《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他又提出“三世”“三统”的概念，“三世”指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这属于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统则指纲纪，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治理方法，特征各异，“三统”则指上古三代之纲纪。董仲舒于此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大一统”是其核心，张“三世”、通“三统”则是指时势变异，当顺时而动，积极改制。这一套理论体系本于《公羊传》的思想，即强调天下一统的必要性，又提醒统治者应注意把握形势，积极改易，其政治建构的意义昭然若揭。董仲舒的学说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公羊传》在《春秋》诸传中的地位也得以确立。两汉时代，《公羊传》成了学者研习的儒家典籍之一。东汉时代的何休为《公羊传》作注，进一步推进了“大一统说”和“三世说”。陈其泰先生指出，何休建构了一套包括“元气”“天”“天子政事”“诸侯治国”五位一体的“世界图式”，王位居中心，形成了“天一王一诸侯”这一层级性的权威决定模式。何休

还进一步发挥“三世说”的时世变易的历史发展观。这些都使得《公羊传》渐为更多学者所接受。

汉代以后,《公羊传》虽然传承不辍,但公羊学的思想体系曾长期受到冷落。直到清代,公羊学才呈现出复兴的迹象。清代中期的乾嘉考据学专注于烦琐的考证,渐渐为学者所不满。清代晚期学者为寻求治理国家积弊的良策,转而提倡学术研究应以经世致用为原则,更主张改革图新。在这一社会思想的背景之下,《公羊传》的改易创制思想遂吸引了大批学者。一方面,清代学者如刘逢禄、凌曙等为《公羊传》重加训诂,阐述董仲舒、何休等汉代学者所发挥的“大一统”“三世”等义理。另一方面,一批关注时事,积极呼吁改革的学者如魏源、龚自珍等将《公羊传》的相关思想发展成政治学说,从中提炼出历史发展、社会变革等观念,为其政治主张寻求合理依据。近代学者康有为更对《公羊传》有着可称为转型性质的思想提升,将其与资产阶级的改革思想和价值观念相契合。

《公羊传》对《春秋》的阐释本就有着较为显著的创新性,而后世学者对《公羊传》的思想阐发则更进一步,将《公羊传》与现实政治的结合则是这些学者在阐释《公羊传》时的突出表现。

二、关于《穀梁传》

与《公羊传》一样,史籍中关于《穀梁传》的作者的信息并不多。《汉书·艺文志》著录《穀梁传》十一卷,其下班固自注曰:“穀梁子,鲁人。”颜师古则注明穀梁子名喜。如此一来,传统看法也多认为穀梁喜当是《穀梁传》的作者。不过,比照《公羊传》的成书和传授情况,我们也有理由认为《穀梁传》当也属于众

手成书的情形。徐彦在《公羊传疏》中提到：“穀梁亦是著竹帛者题其亲师，故曰《穀梁传》。”《穀梁传》的命名情况与《公羊传》正好相同。唐代杨士勋疏解《穀梁传》，对于该书的传承情况也有一简要介绍：

穀梁子名俶，字元始，鲁人，一名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故曰《穀梁传》。传孙卿，孙卿传鲁人申公，申公传博士江翁。

杨士勋在这段介绍中指出《穀梁传》的传承情况，但对于著者穀梁子的名字却与《汉书·艺文志》所载并不相同。这也说明后人所认定的传承线索并不一定属实。

《穀梁传》在先秦时期的传授情况我们难以悉知，不过仍有其他蛛丝马迹可以寻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注意到《穀梁传》中出现了“穀梁子曰”，著书者不当自引己说，这一点已经可以说明《穀梁传》的著者非一。《穀梁传》中也多次引用《尸子》，尸子名佼，系商鞅之师，商鞅被刑，尸佼避祸入蜀。可见，《穀梁传》的成书也不早于战国晚期。

在解经方式上，《穀梁传》同样采取了问答式的叙述方式。《穀梁传》关注的重点与《公羊传》一样，也是以阐发《春秋》之微言大义为宗旨。因此，在对某些问题的解释上，《穀梁传》与《公羊传》具有较为一致之处。如尊重周天子的权威、“以夏变夷”等思想。《公羊传》强调变易和改制，而《穀梁传》在内容上也有其独属的特点。我们略举数端。

首先，《穀梁传》重视对古代礼制的阐发。《穀梁传》多处提到各种礼仪制度，内容则涉及社会政治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鲁庄公二十三年“丹桓公楹”，传文先引相关礼制：“礼：天子、诸

侯黜陟，大夫仓，士黹。”在明示这一等级性的礼制之后，传文随即指出庄公此举显然是不合礼制的。类似的记叙在书中常可得见。对礼制的重视，表明了《穀梁传》严守等级差别的儒家政治立场。同时，这些载于传文中的礼制文本也为研究古代社会思想、道德观念、政治理念等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其次，《穀梁传》重视君臣关系的合理建构。鲁襄公十九年，晋大夫士匄率师侵齐，闻齐侯卒而还。《穀梁传》对此有所评述：

还者，事未毕之辞也。受命而诛生，死，无所知其怒。不伐丧，善之也。善之，则何为未毕也？君不尸小事，臣不专大名，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则民作让矣。士匄外专君命，故非之也。然则为士匄者宜奈何？宜埽帷而归命乎介。

在此，《穀梁传》提出了“君不尸小事，臣不专大名”的命题，即国君对于军事行动等具体事务应不干涉，而大臣对于军队的战略规划则应受国君指挥。这一命题对于君臣功能和权威及其分界提出了明确的界定，这一界定既可以保证国君对臣民的有效控制，维护国君之权威，又可保证臣属在军事行动中有着较为充分的自决权，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保障。可以看到，这种君臣权力的定位是具有良好的灵活性和机动性的。

第三，《穀梁传》对于《春秋》“著以传著，疑以传疑”之精神加以肯定。《春秋》在记事之时，对于可信之材料，则作为可信的材料流传下去；对于那些值得怀疑却有难以遽断真伪的材料，也如实地流传下去。这是一种客观和审慎的著述态度，也成为后世史学研究的一条重要的准则。《穀梁传》对于这类材料都有明确的指示。如鲁桓公五年正月，陈侯鲍卒，《春秋》记其卒日为甲戌、己丑二日，对此，《穀梁传》曰：

鲍卒，何为以二日卒之？《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陈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举二日以包也。

在此，《穀梁传》首先指出《春秋》这一记载方式属于“疑以传疑”，接着解释《春秋》如此书写的原因，是因为不能确知陈侯鲍死亡的日期，为审慎起见，故将陈侯死亡的可能时日都加以记载，以便后世读者明悉事情之原委。显然，《春秋》的这一著述原则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历史真相。《穀梁传》也在多处强调了《春秋》这一著述原则，并同样加以详细解释。从这一点上看，《穀梁传》对这一著述原则是深有体会，并加以肯定的。

第四，《穀梁传》也特别注重统治者施行仁政，反对使用武力。对于这一时期记载的自然灾害，《穀梁传》大体上注意详加评述。对于使用武力，《穀梁传》并不是一味反对，而是认为国家注意武备是应有之事，所谓“虽有文事，必有武备”，这正是《穀梁传》的态度。但是，《穀梁传》反对过度使用武力。如：“伐不逾时，战不逐奔，诛不填服。”这正反映了《穀梁传》对于国家之武力使用所秉持的一种合理态度。

当然，《穀梁传》在解释《春秋》经文方面还有诸多类似特点，我们不再赘述。《穀梁传》作者对《春秋》有着深刻的认识，通过《穀梁传》的解释，我们不仅可以对《春秋》形成更为深入的理解，对于认识先秦时期的社会、文化、思想、政治等也大有裨益。

《穀梁传》在先秦时期的传承情况已经不太明了，但从汉代初期开始，《穀梁传》的传授则出现一个高潮。如前所述，《汉书·艺文志》载汉代传《春秋》者有四家，其中《邹氏传》无师，《夹氏

传》无书，二书未能流传，而《穀梁传》与《公羊传》则先后立于学官，广为传授。《穀梁传》的兴起，一批《穀梁传》经师的大力研习、传授起到了重要作用。汉代初期，《公羊传》大兴，并为统治者所重视，立于学官。汉武帝时，《穀梁传》大家瑕丘江公与董仲舒持论于朝廷，但由于江公口才拙讷，再加上当时以习《公羊传》而位至丞相的公孙弘偏助董仲舒，江公的学说未能得到汉武帝的接纳。到汉宣帝时，《穀梁传》逐渐得到统治者的重视。汉宣帝的祖父戾太子就喜好《穀梁传》，汉宣帝即位之后，又组织《穀梁传》学者荣广王孙、皓星公等与《公羊学》大家睢孟等论难，睢孟等常至理屈词穷。由此，《穀梁传》转而赢得学者的重视，汉宣帝并在朝中设立《穀梁传》博士，持续征聘各地《穀梁传》大家为博士，于中央官学讲论经义。《穀梁传》的这种兴盛局面一直持续不衰，到新莽时期，逐渐形成了《穀梁传》之尹、胡、申章、房氏诸分支学派，一时蔚为大观。

根据饶尚宽先生的分析，《穀梁传》在西汉中后期兴盛起来的原因，与汉宣帝以来欲改汉武帝时期之猛政，奉行宽政的政治思想有关，《穀梁传》中强调礼乐教化、仁德之治的观念显然与这一政治现实暗合。东汉以后，《穀梁传》未能立于学官。失去官方的支持之后，《穀梁传》先前那种在官、私之间广为兴盛的局面一去不返。当然，民间学者对《穀梁传》的研习并未因此而中辍。在解释《春秋》的三传之中，宋代学者胡安国称，“义莫精于《穀梁》”，这也是《穀梁传》得以在后世流行的重要原因。

三、几点说明

《公羊传》和《穀梁传》在一开始都是单行本，并无经文，以

传附经的确切时间已经难以考知。我们今天所见的《公羊传》和《穀梁传》的文本，显然都是经传合一之后的文本。所以，为方便区分经文和传文，我们在文中将《春秋》经文和二传传文分开，并在传文前用符号标示，以方便读者阅读。

《公羊传》和《穀梁传》自传世以来，就得到诸多学者的研究和注疏。就《公羊传》而言，东汉经学家何休作《春秋公羊传解诂》，为《公羊传》制定义例。唐代学者徐彦为《公羊传》注疏，其中保存了不少唐前的相关注释。到了清代，对《公羊传》的注疏又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如刘逢禄的《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魏源《公羊古微》等。对《穀梁传》的注疏相对少一些。自汉宣帝以至魏晋时代，注《穀梁传》者仅有尹更始、孔衍、徐乾、胡讷、段肃等十余家，后范宁有感于各家注疏缺憾较大，遂集合同好，总结诸家所论，成《春秋穀梁传集解》一书，这是当时的集大成之作。范宁之后，徐邈也曾为之作注。到了唐代，杨士勋独力注疏范宁《集解》一书，是为《穀梁传》注疏的第二次系统整理。此后，也有一些学者曾为《穀梁传》注疏。

在众多的《公羊传》和《穀梁传》的注疏当中，无疑以清代阮元组织学者编撰而成的十三经注疏本最为重要。阮元等学者对十三经的注疏进行了系统整理，他们确定的版本也成为后来学者着重参考的本子。我们此次即以阮元的《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本为工作底本，在标点方面，主要参考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的《十三经注疏》校点本及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的《春秋公羊传全译》《春秋穀梁传全译》。

杨 龙

2013年3月25日

目 录

公羊传

隐公卷第一（起元年，尽元年）	21
隐公卷第二（起二年，尽四年）	23
隐公卷第三（起五年，尽十一年）	27
桓公卷第四（起元年，尽六年）	32
桓公卷第五（起七年，尽十八年）	37
庄公卷第六（起元年，尽七年）	44
庄公卷第七（起八年，尽十七年）	49
庄公卷第八（起十八年，尽二十七年）	54
庄公卷第九（起二十八年，尽闵公二年）	59
僖公卷第十（起元年，尽七年）	64
僖公卷第十一（起八年，尽二十一年）	70
僖公卷第十二（起二十二年，尽三十三年）	78
文公卷第十三（起元年，尽九年）	86
文公卷第十四（起十年，尽十八年）	93
宣公卷第十五（起元年，尽九年）	99
宣公卷第十六（起十年，尽十八年）	106

成公卷第十七（起元年，尽十年）	113
成公卷第十八（起十一年，尽十八年）	120
襄公卷第十九（起元年，尽十一年）	126
襄公卷第二十（起十二年，尽二十四年）	133
襄公卷第二十一（起二十五年，尽三十一年）	140
昭公卷第二十二（起元年，尽十二年）	145
昭公卷第二十三（起十三年，尽二十二年）	152
昭公卷第二十四（起二十三年，尽三十二年）	157
定公卷第二十五（起元年，尽五年）	163
定公卷第二十六（起六年，尽十五年）	167
哀公卷第二十七（起元年，尽十年）	173
哀公卷第二十八（起十一年，尽十四年）	179

穀梁传

隐公卷第一（起元年，尽三年）	185
隐公卷第二（起四年，尽十一年）	189
桓公卷第三（起元年，尽七年）	195
桓公卷第四（起八年，尽十八年）	200
庄公卷第五（起元年，尽十八年）	206
庄公卷第六（十九年至三十二年，尽闵二年）	216
僖公卷第七（起元年，尽五年）	226
僖公卷第八（起六年，尽十八年）	232
僖公卷第九（起十九年，尽三十三年）	240
文公卷第十（起元年，尽八年）	250
文公卷第十一（起九年，尽十八年）	256
宣公卷第十二（起元年，尽十八年）	263